



1941年后,日军大规模实施“治安强化运动”,胁迫白晋线两侧村庄建立维持会,以承认日伪统治。敌占区和游击区对敌斗争形势迥然转直下,沁县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两面政权”斗争形式,破坏了敌人的阴谋,保护了人民利益,达到积蓄力量,持久战胜敌人的目的。

1939年7月,日军打通了白晋线,分割了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在白晋全线重要村镇,设立了据点,在加强占领区的治安统治同时,对游击区以蚕食为主,胁迫维持。面对这种形势,我党提出了“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的反蚕食斗争方针。

1941年初,仅白晋线沁县段8个据点,日伪军达2000人。并且于3月初,开始实施“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军在“剿灭共党,安居乐业”的幌子下,以软硬兼施的办法胁迫白晋路两侧30里的村庄建立维持会,以承认日伪统治。他们宣传日本人、中国人同文同种,中日一家、中日提携,来帮助蒋介石剿共,不杀老百姓,剿完共就走等欺骗性宣传。在深入村庄宣传时,给群众、儿童散发糖果、纸烟、饼干、罐头等食物作为诱饵。抓捕一些无辜群众,给予欺骗拢络后放他们回去瓦解百姓的敌对情绪。同时利用各村反动势力、会道门、地痞流氓里应外合促进维持,对于不维持的村,就以烧杀、绑架手段进行威胁。例如:沁县乔村不维持,他们就放火烧房屋,同时还抓走人和牲口。沁县十区大部分村庄由于不维持,魔掌据点敌人疯狂出动,仅待贾一村就杀8人,烧毁房屋50余间。扬言不维持鸡犬不留。在此情况下,出于保护群众,全区12个联合村有9个联合村未通过抗日政府许可,偷偷地建立了维持会。

日伪在建立维持会的同时,开始颁发良民证、居住证,外出要请假,否则以“通匪”治罪,目的在于割裂我抗日政府与敌占区群众的联系,

太行武工队在俺村

讲述人:史水生 史留孩 整理:史俊峰

大约1935年初冬,太行山刚下了头一场瑞雪的时候,沁县东乡来了五六个说是家住吕梁的猎人。他们个个身强体壮,行走如飞,还会武功,会配制火药,制作夹弓,他们两人一组,每天上山打猎,收获颇丰。他们当中,有人会用大缸灌制皮毛,将打回来的野兔、狐狸的生毛皮制成熟毛皮再卖掉。他们的头儿叫高文。因他是个秃子,当地人习惯地叫他“秃高文”(化名,实际叫刘彬华)他就是后来的太行武工队队长。

那时候,太行山山高林密,灌木丛生,适合野生动物生存,山里人憨厚善良,不习惯杀生,也没有猎枪,更不会打猎。且那个时候,山坡野地也就是亩产百把十斤粮食,连粗糠稀饭都吃不饱,哪有肉可吃。这些猎人们每天打的猎物很多,除到城镇集市卖掉换些米面盐油外,剩下的就自己煮着吃。有一个叫郭振华(化名)的人就会熟制皮毛,也会煮肉,人缘更好,他们对老乡亲们很热情,上山打猎经常接触一些在山上放羊放牛的穷汉,就给他们烟抽,晚上回来煮熟猎物,就叫村里放羊放牛穷汉和小孩们来吃肉,一来二去就都熟了,还用兔、兔皮的下脚料给羊羔、孩子们做副取暖的毛耳朵。时间一长,相互间处得很好。老乡亲们也把粗糠、秕谷、干枣炒的炒面给打猎人吃。这也是“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期间秃高文还和沁县新店镇史家庄村史留孩成了朋友,他们教村民们怎样跑山,怎样打枪,怎样练武,怎样找兔窝,安装地弓、进口炸等。因史留孩家是一般实农户,住宅较为宽敞,所以他们打完猎回来常住在史家。回家(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陕北人)过完年,开春再来太行山上打猎,还住在史留孩家。实际上他们的住宿很不固定,他们打猎的行踪很远,有时候还跑到武乡、榆社、辽县、襄垣、黎城、涉县等地。那个时候交通极不方便,从沁县过史北到王村,穿临漳至西营,到麻田有一条随山就势的山路可通,沁县人在冬闲时要到武乡担梨,去黎城担砂锅,过河北涉县担棉花,路上遇见过他们在那里打猎,可见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广,接触人员众多,对太行山的地形山水很熟。

1937年8月,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东渡黄河来到太行山,这些猎人也换成了快枪,人手一支撅把子(每次装一发七九子弹)手枪,还有一把剔骨尖刀,正式透露他们是八路军领导的太行武工队,主要活动仍在白晋公路的沁县、虎亭、襄垣夏店以及榆黄公路的武乡、襄垣王村西营一带。那个时候阎锡山教人们唱反动歌曲,“共产党坏东西,共产还共妻。”“(共)匪军杀人如割草,穷富都杀光,男女老少都遭殃。”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模样,很害怕,这时候太行武工队就向老百姓宣传抗日理论,教唱抗日歌曲,“日本人烧杀抢,中国民众都遭殃……”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红军,也不了解八路军,可认识这些猎人,都知道他们是好人,和穷苦的人们一条心,敢跟他们接近谈心,愿向他们传递信息,爱给他们赠送食物、衣服,甚至保护他们的生命。“猎人”队伍中还有个文化人,会写字,能画图,对沁县、武乡、襄垣、黎城等县的大小河流、山山岭岭、村村寨寨都十分熟悉,画了图形,标有地名。由于他们行动绝对保密,老百姓也不问他们作甚。

1938年农历三月初八,从长治上队一行八人。新店镇里人大部分都逃难离村,只有两三个老弱病残人在家未走,那么大的一个非常繁华的新店镇,临街有五六百间房屋及货物被日本鬼子一火烧光,连同屋内的两病人一并烧死。这更加剧了中国人民对小日本鬼子的仇恨。广大民众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坚决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

日军侵入沁县后,太行武工队发动民众,组织队伍,杀敌人捉汉奸,烧桥梁,割电线,扒火车,拗铁轨,搞得日军手忙脚乱,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不敢夜行。他们还在史家庄、蒲沟设有前哨所,侦探日军情报,给八路军报信。

有一次,刘彬华因大意,在襄垣高崖上村遭遇一队日军,躲闪不及被日军抓去,关在新店火车站。刘彬华大骂侵华日军头目小山(日本人小山是新店火车站站长,也是小山工作队队长)。小山扬言要枪毙刘彬华,第二天下午,由两名日军押着刘彬华到漳河湾枪毙。枪声响过以后,我村人痛哭流涕,准备晚上去漳河湾找回彬华尸体埋葬。夜晚派去的人没有找到尸体。第三天下午,刘彬华笑着从小西沟跑回史家庄,朗声说:“小山他敢枪毙我?武工队炸平新店站!”原来刘彬华会武功,一下就把两个日本兵,钻进路旁玉米地而脱身,只听到身后传来两声枪响。后来在太行武工队的帮助下,成立了太行游击队,他们便远走高飞。我村有史俊明、史留孩、刘彦成三人参加了游击队,后改为太行独立营,营长叫马玉喜,是襄垣县鹿亭镇祝家岭人,教导员叫马中央,是沁县新店镇蒲沟村人,生前在山西省供销社合作工作。沁县有句老话:“东怕独立营,西怕安新民(沁县挖墙村人)”,独立营就指的是太行独立营,后又扩编成太行独立团,最后划归陈庚三八六旅,归八路军建制。村里人给武工队编了一段顺口溜:“武工队,真正神,队长名叫秃高文。队员个个是三分,行走如飞枪法准。保家卫国护百姓,你们跟咱一条心。日伪汉奸胆颤惊,小山队长怕三分。夏店丢了俩日兵,陈村翻译影无踪……”

1968年夏秋之际,由天津市革委会专案组两名工作人员持介绍信,来史家庄调查刘彬华被俘事件经过,说刘在天津警备区工作,是四川仪陇人,又说刘是叛徒。刘刘彦文(村老支部书记)、史留孩(老共产党员,老支书,老游击队员)调查落实此事,因我当时是村里民兵干部,所以在场。他们都证实刘彬华没有叛变。因当时村人曾打发村民史金川以给日本送野枣为名,到新店火车站探听消息,亲眼听到刘彬华大骂小山一夜。刘彦文、史留孩两都以共产党员身份给专案组提供了证明材料,以后就再没有刘彬华同志的信息了。



两面政权

李国庆

以孤立我抗日军政人员的活动。并积极组织新民会、自卫团、新民小学、来奴化青少年,加强敌伪情报,捕杀我抗日人员,光沁北地区就有八、九名党员区村干部死于敌手,太岳区有近百名干部牺牲。日伪毒辣阴险的手段使我抗日斗争陷入了被动地步。甚至连我们党占优势的村庄也偷偷建立维持会,给敌人送钱、送粮,只要求敌人不要来扰害百姓。更有甚者,害怕我抗日人员到来,引来敌人的骚扰现象,维持会形成既应付敌人,也应付我们抗日政府。

沁县是太岳区接触面最长的边沿县,全县除被白晋路沿线10余个敌据点东西分割外,西边太岳区境内距敌30里以内的村庄几乎全部成立了维持会,最为突出的是有些村支部及抗日村长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秘密地维持了日军。但是沁县县委没有从战争客观的变化,研究新的对敌斗争对策,而仍是坚持“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的旧方针。发现哪里维持就去哪里进行打击,这种办法引起维持会群众极大的不满,形成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突出暴露,裸体跳舞的局面,在失去群众保护的情况下,我抗日干部到达游击区活动时,则由于汉奸告密等原因,而被捕捉杀害之事时有发生,至使抗日干部很难落脚。

毛泽东曾指出:“当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沁县县委在反维持斗争中也正是在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情况下,发号施令去坚决打垮维持的。维持会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我们抗日政府与群众形成三脱离现象,造成了群众和革命力量的损失。但与此同时,县委也有另一种不同的态度,那就是承认事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共同推荐一人出面维持,或由我们的抗日村长出面维持,这样的人是党支部指定的,我们的村政

权依然存在。与其让汉奸组织维持会反对我们,不如由我们主动组织来欺骗应付敌人,这样既保存我们的力量,又减少群众的损失。沁县县委当时将这两种对敌斗争的态度,报告了太岳一地委书记杨文后,杨文迅速将这个情况写成报告,反映给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安子文是太岳抗日根据地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对这个报告高度重视。决定围绕沁县反维持斗争进行调查研究,组织区党委的巡视团,结合地、县领导深入沁县游击区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创造经验,以推动全区的对敌斗争。1941年3月,安子文率区党委巡视团进驻沁县后,巡视团结合地、县人员分两组分区深入农村进行工作。在对维持村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维持会长短分三种人:一种是死心塌地事敌的汉奸、土绅,而且是主动去建立维持的;第二种是在迫不得已由村人商议后,推荐村有威望、会办事的人担任的;第三种则是在村民的要求下,由村党支部决定由抗日村长兼任的;第三种则是真正的“两面政权”,他们为我抗日政府工作为主,以拖延的办法应付敌人,同时还能为抗日刺探敌人的情报,为我抗战服务,积极从群众利益出发办事,群众是满意的。

通过这次在敌区附近听取党支部和群众意见的调查,情况表明:与其让汉奸组织维持会来反对我们,不如由我们来组织维持会去欺骗应付敌人,这样既可以保护群众利益,同时便于我方隐蔽、蓄积力量,展开新的对敌斗争。安子文在沁县县委所在地官庄村作对敌斗争调查总结时,指出:“为了避免损失和牺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由我们的人出面维持好,这样敌情我们清楚,自己的力量可以保存,群众的财物可以少受损失,这就叫“两面政权”,实际上是我们领导抗日政权另一方面。”他还提出了具体斗争策略:“在敌人开始威胁成立维持会时,可以

口头答应,实际不维持,采取拖延政策。实在在拖延不了时,可以由我们指定人出面维持,用各种办法欺骗、应付敌人。敌人要东西,能不送就不送,实在不行可以少送一点,有时还可以谎报军情,说在路上被游击队抢走了。一旦时机成熟,就解散维持会”。后来把游击区维持与反维持的“两面政权”斗争经验概括为:“从推延到维持,从维持到拖延,拖延中有维持,维持中有拖延”的策略。

在实行“两面政权”的同时,在安子文指导下,在游击队、决死队配合下,对三、五、七、十区主动维持敌人的维持会进行了打击,仅5月7日晚一次行动就抓回维持会长80余人,抗日政府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帮助他们端正态度,争取他们积极抗日,区分情况,分别对待,对于表现好的教育释放,对于罪大恶极的坚决镇压。对于这些村子,需要继续“维持”的,由各村党支部负责,选出思想进步、忠诚抗日、能随机应变的人担任维持会长、书记员和情报员,建立起红心白皮的合法维持会。从此,我党耳聪目明地与日伪展开灵活的斗争。在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下,沁县反维持斗争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1942年10月间,刘少奇赴延安途经太岳区时,在听取安子文汇报后,明确地指出:“这种两面政策,实际上就是使用合法的形式在敌人进行斗争。合法斗争即两面政策,两个术语的含义是相同的。”从而从理论上进一步肯定了“两面政权”斗争的正确性。

“两面政权”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斗争策略,不但容易为群众接受,而且适应了战时的斗争需要,它的全面推广应用,为整个敌占区的对敌斗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抗日战争中为人们赞赏的斗争手段之一。电影《平原游击队》所展示的正是这种斗争艺术的结晶。

那年我七岁

栗文庆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军发动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沁县被日军占领。日本帝国主义横行霸道,实行“三光”政策,给沁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城乡战火连绵,硝烟四起,沁县人民生灵涂炭,苦难深重。

记得在一九四四年中秋节过后,父亲牵着牛在村东坡犁地。一天早上母亲拉着我,提着饭给父亲送。走在东庄坪坳,对面来了三个人,穿着便装,把母亲给我的干粮、水果全部抢光。母亲感觉不对,快步拉我上了东面的庄稼地,隐藏起来。不大一会,一股日本鬼子兵拉着狼狗,扛着枪,从大路上由南向北去了。敌人走后,母亲拉着我到了地里,只见牛在地,不见父亲踪影。母亲以为敌人把父亲抓去了,很是着急。我也害怕了,急的哭了,便大(爸)来、大(爸)来叫了几声,父亲听见是我的声音,从庄稼地里钻了出来。慌慌张张地对母亲和我说:“好怕呀!不是跑的快,就被敌人抓走了。后来听说是大桥沟哨棚上的日本兵到南里一带扫荡。”

一九四五年夏天一天,日本鬼子从城出发,到故县镇扫荡。天未明,村里的狼狗的特别厉害。不一会听了见敌人来了,把我家大门砸开,进来两个日本鬼子,进家后,不说二话把父亲抓走了。到了上午又有一股敌人拉着狼狗进了村。见家就进,见人就打。吓得全村人跑的跑,躲得躲。我跟着村人跑到东庄坪坳隐藏起来,中午也不敢回村。到下午敌人从故县镇出发返城,路过我村东大路。拉牛的,赶羊的,拉着牲口拖着东西的,还有背着行囊的,拉拉流流过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几个日本鬼子发现了我们,一边打枪,一边朝我们方向追来。一下子把躲避的村人冲散

侵华日军在沁罪行录

禹耀忠

岭稍的牛大犍、牛二犍、刘毛孩也被日军刺死。日军还在张金魁院内将张玉庆的伯父、张哑巴、张娃娃、牛付文、西渠上村张永和的伯父5人列队打靶,打死4人。还杀死陈阵的母亲,日军这次行动共杀死村民12人,烧毁房屋20余间。

沁县城“三·二四”空袭惨案 1939年3月24日,日军飞机四架,轮番轰炸沁县城,当时在南街弹毁最多,在县城十字附近其状更惨,老槐树下血肉横飞,树上挂着被炸飞的人肢和血衣布片,有个防空洞口被炸塌封口后,闷死3人,监狱里牢房炸塌后,炸死6人,这次空袭共炸死26人,其状惨不忍睹。

故县镇“4·4”空袭惨案 1939年4月4日,日军飞机3架再次飞临故县镇,弹毁200余枚,这次轰炸炸死6.7人,将故县镇奎星阁、奶奶庙及街面的众多商店店铺炸毁,损失惨重。

故县镇惨案 1939年7月6日,日军109师团入侵沁县后,其中一部于6日南侵故县镇。当夜,日军挨家挨户搜掠粮食财物,并见人就抓,天亮后即施行集体屠杀,这次共杀害19人。日军屠杀后,沿街大肆放火烧房屋店铺,故县镇两条大街成了瓦砾一片。

南王村惨案 1939年8月3日下午三时许,日本陆军第109师团侵占沁县之一部全部出动,包围距沁县城东五公里处的南王村,企图消灭当日上午在这一带打击日军行动的山西第三专员公署保安二支队。日军进村后,大肆烧、杀、掠、抢。他们将未转移的村民乔春风、魏巨金、乔补金、乔二管、魏免孩等人用刺刀刺死,或用指挥刀劈死。乔四苟被逼上窗台后,用指挥刀砍了四刀而惨死,辏文俊被刺遇害后又仍入粪坑内,王婉婉被日军抓住活活扭死,魏英武及妻儿三人被锁在房中活活烧死。日军的暴行一直持续到晚7时才结束。事后经清理,日军在南王村共杀死无辜村民23人,烧毁房屋280余间,捣毁窑洞13孔,抢走粮食4000余斤和部分财物、牲畜。

2015年9月3日,是中国首个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了《关于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及其他有关活动的通知》。

我们沁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70年前,沁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奋勇抗敌,付出了巨大代价和牺牲,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血火淬炼的抗战精神,在历史的星空早已定格成永恒。为了进一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根据总体安排,本报从今日起推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宣传专题。具体栏目为:抗战名词、抗日英烈、抗战故事和纪念诗文集,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歌抗战模范县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张景玉

沁州地区,古属上党。民风淳朴,文化传唱。浊漳源头,现建水乡。杂粮丰盛,小米甜香。日本侵华,野蛮疯狂。朱、彭司令(注1),率部入乡。深入发动,男女齐上。“四出”(注2)贡献,上级表彰。抗战八年,模范县当。功载史册,后世英名。全县人民,永远跟党走。

注1:指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

注2:高扬文同志题词:“沁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出兵、出干部、出粮食、出经验……”

我亲历我讲述

小王村惨案 1939年8月14日天刚亮,日军从白家沟、轻城三眼桥、大桥沟三个据点调集了100多日伪军把小王村团团包围,在村杀死村民王富先,并抓走7名村民。在大桥沟村水坑前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审问,问:小王村的八路军是谁,谁给八路军通风报信?他们坚贞不屈,宁死不说。日本人恼羞成怒,放狼狗咬,然后用刺刀一个把他们活活砍死,有的砍了脑袋,砍断腿,仍进水坑。当时现场血流成河,残不忍睹。除杀死8人外,还抢走大量牲畜、骡马、牛驴,共计28头,其它财物不计其数。

荆村惨案 1939年9月27日,驻县城日军,突然包围驻荆村的黑峪沟编村村公所,放火烧毁村公所民房,烧毁秘书书××,牺盟协助理员王广林、公道团长杨应堂,打死自卫队副大队长李聚才,杀害自卫队骨干模范小组唱兵张兆虎、张小先,掠走自卫队员5人,活埋于南石城虎掌沟。此次残杀干部、自卫队员11名。

红坡村惨案 1939年10月13日,日本陆军第20师团盘踞沁县段柳、新店据点的部队集结,于凌晨包围沁县城西南2.5公里处的红坡村,企图消灭转移至该村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一纵队游击二团某排。日军的行动被发现后,排长命令三名战士团保护全排战士带领村民转移。三名战士奋力阻击,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负伤,被日军抓获。日军入村后,四处抓人,抢掠财物。他们将未来得及转移的村民张五孩、张太清、王苟孩等13人,驱赶到谷场的,周围架起机枪。他们先将三名负伤战士活活烧死,然后把村民一一拉出来,作为刺杀的活靶子,逐一劈刺杀死。被害后尚呻吟、扭动身躯者马上再补刺直至死亡。只有王宿元、王星二人被刺后,没有致命,才侥幸死里逃生。日军这次暴行,共残杀无辜村民和战俘14人,杀伤二人。

抗战史料